

## 公共情感：一种认知性环境批评研究视域

贾 晶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深圳 518000）

---

### 摘 要：

公共情感作为环境批评的研究视域，重在阐发一种扩展性同情与相互之爱。与环境伦理诉诸的关怀伦理一致，共同指向环境批评与现实空间的关联性。公共情感具有认知性，是一种判断性评价与表达，能够理性与明智地指引我们的实践行为。公共情感纳入环境批评的视域，突出了环境批评实践的伦理价值，有助于实现环境批评的价值向度。

### 关键词：

公共情感；环境批评；认知诗学；价值向度

### Public Emotions :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Jia Jing

（ School of Humanit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00, China ）

### Abstract:

As a research perspective in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public emotions emphasize an extended sympathy and mutual love. In alignment with the ethics of care advocated by environmental ethics, it jointly points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and real-world spatial contexts. Public emotions are cognitive in nature, they are evaluative judgments and expressions that can rationally and prudently guide our practical actions. Incorporating public emotions into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highlights the ethical value of

---

作者简介：贾晶，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文学研究。

critical practice and contributes to the realization of its value dimension.

Key words:

public emotions; environmental crisis ; cognitive poetics; value dimension

---

## 0 引言

公共情感 (public emotions) 是一种认知性环境批评研究视域。环境批评 (environmental crisis) 是有着深厚伦理向度的批评方法。生态危机是人类层面、生态层面、国家层面、社会层面的公共性问题, 是一种共业的存在。当下面临一种临界状态, “人类几千年延展演化下来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关系方式、心性状况、价值体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 几乎同时出现了重大动摇和改变”(刘洪一, 2021: 185)。为了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新的目标, 而公共情感对国家向其目标的前进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作为以扩展性同情和相互之爱为基础的公共情感具有认知性, 是一种判断性评价与表达, 能够理性与明智地指引我们的实践行为。“所有社会都需要考虑对失败的同情、对不公正的愤怒、为支持包容性的同情而限制嫉妒与厌恶。……必须打动民心, 并且需要着意于激发人们对其所面临的共业怀有强烈的情感。”(努斯鲍姆, 2022: 3)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 唤起并维系对一些有价值项目的强有力承诺是重要的, “比如社会再分配、完全包容以前受排斥或边缘化的群体、环境保护、对外援助以及国防建设”(4)。

努斯鲍姆关注的是完成共业的空间。当我们把公共情感的应用范围从人类社会延伸至生态界时, 在关注自我生存环境的同时, 会关注到周边环境、生态界的平稳与安全, 对生命本身的同情会超越自我, 延伸至生存的大环境, 乃至整个生命共同体。在公共情感的指导之下, 我们在特定的语境与境况当中, 在尊重生命共同体的前提之下, 观照特定生命的生存权利, 在力求关注整体的视域中保护个体的生命权。环境批评需要在公共性和个体性兼顾的包容性中考察文学与文化文本。人类的理性与情感处于相互影响的间性互动当中, 面对生态界, 绝对的理性会在人类对生命共同体的理解中产生桎梏, 我们需要将情感智性、关怀伦理纳入生命共同体的观照当中。

## 1 环境批评的旨归

当代环境批评进入跨学科的范畴之中，认知诗学的视野被纳入环境批评的领域。环境批评不仅关注文本外部的环境，而且转向文本内部的叙事结构，研究叙事如何呈现出人类的环境建构、环境焦虑，引导读者在故事世界中生成环境认知。以美国学者艾琳·詹姆斯（Erin James）在《故事世界协议：生态叙事学与后殖民叙事》（*The Storyworld Accord: Econarratology and Postcolonial Narratives*）中提出的“生态叙事学”为代表，其“将生态批评对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关注与叙事学对作家创作叙事的文学结构和手法的关注结合起来”（James, 2015: xv）。其将环境批评与叙事研究结合起来，分析作品是以什么样的叙事方法呈现环境正义、环境焦虑、环境危机，引导读者进入故事世界，将读者阅读视为一种沉浸（immersion）或传输（transportation）的过程。同时，在“非人类转向”（non-human turn）思潮的影响之下，环境批评关注作品中的非人类叙事，其包括超自然物叙事、自然物叙事、人造物叙事、人造人叙事。（尚必武，2021: 124）我们将环境批评的视野扩展至动物、植物等非人类的身上，其中关涉环境批评与关爱情感之间的关联。叙述环境正义、关怀非人类处境的叙事能够让“人们有能力以想象的方式进入遥远他者的生活，并产生参与其中的情感”（范昀，2022: 76），唤起人类对环境危机的焦虑、对过往生态的怀旧、对当下环境异变的乡痛等环境保护的情感认知。进而，情感认知转化为一种伦理意识与认同，在环境批评中作为研究视域培养读者对环境危机的智性认知与环境灾难的生命共情，即文学内蕴的诗性正义培养着积极的情感，这种情感又能够化为伦理，引导批评实践。

解决生态界的危机，达成生态界的平衡是环境伦理与环境批评共同的旨归。环境伦理有着关爱伦理的指向，因之与公共情感建立了关联。公共情感包括扩展性同情、相互之爱和理解。公共情感的介入使得环境伦理超越了道德，将关爱转化为一种意识与认同。我们对环境的关爱不仅源于一种价值建构，而且环境本身就是我们生存的根本，其关乎我们的生命存续。即情感“不仅需要关于价值的信念，还需要关于某件特定事情的信念：相信那些外在于我们、我们不能完全掌控的事物是有价值的和重要的”（暗蓝，2024: 126）。环境批评需要落于环境伦理上，旨归是整个生态界的平衡与稳定，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需要公众的理解与践行才能取得批评的效果，实现价值的向度。其所达成的诉求具有强烈的公共性特征。首先，环境批评学者具备了公共

情感研究视域，会对人类与自然所遭遇的矛盾和苦难产生深深的同情；其次，公众在批评实践中被培养公共情感，与环境伦理并行、融合，经由叙事的力量，完成对生态界内在价值的认同。生态写作与批评都是一种生态叙事，尤其是在环境批评当中，面对公众，我们要将同情、爱和正义编织于批评的叙事当中，让公共情感成为我们理解生态界的视域。在此，我们由内心生发的同情将有利于生命共同体的建设与表达。

环境伦理一方面观照生命共同体结构，另一方面观照个体生存的阈限与边缘群体的生存与文化。其“以仁爱为情感基础，以环境体验为前提，以关爱之心、关照之责为具体表现形式。一方面，它具有布伊尔提出的‘弱势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环境伦理观兼顾濒危物种与濒危人群的特点；另一方面，相比布伊尔的环境伦理，它注重环境伦理实施的具体语境、情感基础，强调环境伦理的示范性、操作性，突出环境伦理的关爱话语与关照之责”（方红，2014：24），将体验性、情感性、场景性的重要价值表现出来，与努斯鲍姆阐释的爱对正义的重要性这一命题形成互文与互通。并且，“公共情感”的超越之处在于爱是一种意识与认同，是完成公共事业的情感认知。在环境批评的过程中，要以同情性、关爱性、宽容性的视域面对文本与场景，注重特定环境当中的情感指向与情感认同。在理性与情感的双重考量中认知文本与事件，以仁爱作为伦理考量的底层逻辑与情感基础。环境伦理强调的关爱、大爱是一种公共性的情感。仁爱善行不仅包含正义的欲望，而且超越正义的欲望，进入一种崇高的同情与博爱的境界当中。如罗尔斯所说，人类之爱与正义感“都包含着行使正义的欲望。前者更强烈和更广泛地表现这一欲望，它除了正义的义务之外还准备履行所有的自然义务，甚至要超出它们的要求。人类之爱比正义感更为宽广全面，它推动着分外有功的行为，而后者却不如此”（罗尔斯，2009：149）。所以，我们要将基于关爱的公共情感纳入环境批评研究的过程当中，使得我们对文本与场景的批评与实践更具公正性、包容性和情感性。

## 2 公共情感作为认知性环境批评研究视域

环境批评关注由人类改造后的生存环境，自然不再是远离喧嚣的荒野，而是参与人类生命的周边环境。环境批评不仅在于远方的荒野，同时还有脚下的土地。更重要的是，远方的荒野与脚下的土地都是经由人类改造过的环境，它是生命共同体与扩

展伦理的成员。正如克里考特所说,“生态学是关于共同体的科学,生态良知是社会生活的伦理”(Callicott, 1991: 15—16)。环境批评的价值意义超越文本细读的批评与研究,超越学术意义的阐释与考证,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指导价值。努斯鲍姆研究与阐释的公共情感为环境批评提供了一种仁爱的伦理向度,有助于实现环境批评的内在价值。

公共情感作为环境批评学者的研究视域,具有“事件”性的意义。这是一种开创性的、面向未来的视域。在比较文学中,视域(*perspective*)是一种语际多元透视的研究视野或研究眼光(杨乃乔, 2017: 128),强调研究主体对问题的深度透视。公共情感的视域并不是对文本内容的一种事实性的说明,而是一种事件性的阐释。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事件建构,具有“过程性、流动性和不可预测性”(张进, 2022: 21),具有向未来开放的未完成性。研究者在此视域下是一种“经历经验”的过程,而不是“拥有经验”的过程。换句话说,创作者、研究者、读者共处于一个事件所生成的世界中,处于全新的创建过程中,对现有思维进行认知开拓。在具有开放性的认知空间中培养正向的、积极的公共情感,避免或者消解人们因未知、焦虑与恐惧造成的环境疏离,不仅在个体生命价值层面与人类的美好生活相关,而且在现实维度事关人类与非人类的未来存续。当代环境危机频发是一种全球风险与全球事件,对环境危机的认知扩散需要公共情感的培养。我们惯常认为生态危机、气候灾难是发生在远方、全球的事件,我们在理知层面上习得全球变暖等气候事件,但是似乎仅限于此。只有当我们理解全球即是在地的,远方的受难者就是在地的每一个你我,只有在道德情感的层面感知作为现实的灾难,才能与理知并行,脱离环境疏离的现状。公共情感作为一种认知性研究视域,是一种朝向未来的价值取向。

情感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激发点,一旦我们将个人情感汇聚在一起,它就能够成为改变人类历史的一种动力。在建立合宜的社会(*decent society*)的过程中,公共话语背后的深层规范性具有法理层面与道德层面的双重性。情感在理解与稳定“道德的规范性”(moral normativity)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情感不仅是形成良好感知的重要辅助,而且自身就包含了重要的认知,情感是成就实践智慧的重要条件(范昀, 2022: 71)。20世纪的“情感研究”在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灵长类学、动物学的实证证据的支持下,不再被视为“情理二分”视域下的单一单元,而是一种多维度的心理过程与心灵状态。情感是智性的,涉及对外部世界

的认知评价 (cognitive appraisal)。(努斯鲍姆, 2022: 译者序 3—4) 公共情感是指一种以扩展性同情 (extended sympathy) 和相互之爱 (mutual love) 为基础的公共文化, 能够支持公正社会的目标。努斯鲍姆强调, 所有现代的社会都需要培养民众的公共情感。一些杰出的领袖之所以能够成功, 原因之一就在于, 他们懂得如何打动民心, 如何激发民众对共同事业的强烈情感。关于生态界的问题, 环境批评面对的不仅是知识分子的理论阐释, 更是一种公共的环境问题。在公共情感视域当中面对公共事业, 表达了对生命共同体的爱。努斯鲍姆认为, “爱——如同所有情感一样——在我们的认知评估中起着重要作用, 从而影响我们的理性思考”( von Mossner, 2018: 51)。她主张, “适当的同情与爱”( appropriate sentiments of sympathy and love) 不仅在个人交往中至关重要, 还可以通过让我们对遥远的他者 (包括人类与非人类的痛苦) 产生共鸣, 从而帮助我们克服不公与剥削 (51)。作为以爱和扩展性同情为基础的公共情感, 具有认知性的成分, 对行为动机、道德和实践具有深远的影响。努斯鲍姆认同情感的认知性, “她对这些情感的态度是基于它们所包含的认知和判断, 她推崇爱、宽恕、痛苦、怜悯和同情等情感”( 陈芬, 2021: 201)。即努斯鲍姆认为情感由广泛意义的认知性状态组成。公共情感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性的评价与表达, 能够理性与明智地指引我们的实践行为。

努斯鲍姆把情感视为对价值感知的理智反应。认知性理论认为, 情感要么部分地、要么全部地由广泛意义上的认知性状态组成。这就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情感认知性理论, 即所谓的判断主义 (judgementalism), 它强调情感在本质上就是 (或者必然包括) 评价性判断 (努斯鲍姆, 2022: 译者序 13)。“情感的认知性内容取决于我们理解和评价对象的方式。所有的情感都涉及某种指向对象的、理智的想法或感知, 以及某些对对象之重要性或显著性的评价性认可。情感反应是对某个对象的判断; 这些情感判断是价值判断的一个子集。”( 努斯鲍姆, 2022: 译者序 14—15) 在环境批评中, 引导读者面对环境危机采取重视、关注与同情的态度, 从而对接下来的实践行为做出改变。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阐释了“土地伦理”的观点, 将我们的视野和对生命的理解置入人类与生态界的根本连接, 我们对生命共同体的公共情感是在对土地伦理的认知中做出的伦理判断。在公共性的视域中, 我们才能够理解生命的整体性, 培养对共同体的深厚情感。在公共情感的视域中, 我们能够达成一种扩展性的同情状态, 这种状态是一种超越物种、种族、性别的公共同情。

在阐释公共情感所具有的共同性旨归的同时，我们需要思考，公共情感是否会限制个人自由，是否与自主的自由观念不符。当面对生态界形成一种扩展性同情的时候，是否能够真正达成环境伦理所追求的平衡。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失落了个体的观点与情感。努斯鲍姆梳理了洛克、卢梭、康德面对特定类型情感培养的态度和观点，尤其指出，康德认为不良的社会行为根源于人性，是一种根本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当中建议建立了一种公共宗教，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惩戒与强制，会导致暴力与残忍。努斯鲍姆指出：“在不以卢梭的那种方式变得不自由与独裁的情况下，一个合宜的社会为了稳定和激励如何才能比洛克和康德做得更多？”（努斯鲍姆，2022：7）在努斯鲍姆看来，“情感不仅是冲动，而且包含评价，含有可评价的内容”，“情感可以支持一个有抱负却不完美的社会的政治文化基本原则，设想一个生活领域，如果所有公民都赞同平等尊重的基本准则，就可以期望所有公民重叠：罗尔斯所称的‘重叠共识’领域”。（8）在此基础上，努斯鲍姆包容个体的经验，“新的博爱必须保护……幽默和个性有自由发挥的空间”（39）。这是一种更加温和、仁慈，更具相互性与关联性的公共情感。我们看到，公共情感对公共旨归的追求中会包容个性自由发挥的空间，在特定的案例当中，对环境正义的追求会考虑多方因素。当公共情感的培养目标是建构起对环境的热爱、同情与认同时，环境批评成果的影响将会切实地落在对大地的关怀中。

努斯鲍姆认为所有的情感都是“幸福式的”（*eudaimonistic*），这种幸福主义（*eudaimonism*）不是利己主义，而是承认其他生命具有内在价值。与罗尔斯顿在《环境伦理学》中所强调的自然中的生命体有内在价值的观点相同，“每一个有机体都是价值的一个增殖器”（罗尔斯顿，2000：254）。生态系统是一个网状组织，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相互交织，成为一种关联。我们在对自我的爱延伸至对环境的爱的过程当中，需要将自我与环境关联于一体。一些会激起我们内心深层情感的人，是我们通过对有价值生活的想象而以某种方式与他们相联系的人，努斯鲍姆将其称为“关注圈”（*circle of concern*）。“如果远方的人们与抽象的原则要支配我们的情感，那么这些情感就必须因此以某种方式将它们置于我们的关注圈内，造成一种属于‘我们的’生活的感觉，其中这些人与事件是作为我们及其自身繁荣的一分子而与我们有关系。”（努斯鲍姆，2022：14）关注圈由自我走向社会、走向环境、走向生态界，是一种对关联性、关爱性、同情性的认知与实践。即当我们看见环境危机发生时，不论在任何地域

发生都是在地的，都是与我相关的，认知到环境危机与我息息相关后生成同情与爱的情感，进而更加重视环境危机的严峻性。爱是维系一个合宜社会的核心情感的根源，指意志控制范围之外的对事物的强烈依恋，培养对生存环境的爱有助于实现环境批评的旨归。“罗尔斯所设想的依赖原则（principle-dependent）的情感，如果不补充或注入这种爱，就会过于冷静，太过靠近心灵的表层，从而无法达成他想要实现的目标。”（19—20）而这种爱最终走向了一种博爱，消解着人类之间的对抗性、冲突性，让人类走向更加宽容的情感空间。

### 3 公共情感视域指导下的环境批评研究实践

为了在整体性的关注中兼顾种族与性别的问题，环境正义与生态女性主义应运而生。多种思潮有着重叠与交叉的部分，思想的共同旨归是追求平等与公正。在追踪种族与性别的问题时，关联出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美国印第安作家路易丝·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的文本中可以看到对印第安文明保留的渴望，对女性之间相互之爱的友谊的捍卫，对印第安居住地生态环境恶化、保留地文化消失的悲伤。在文本当中，那种对焦虑的书写，表达出对原住民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被挤压和变形的不安和恐慌感，让我们感知到境况的严峻性。在厄德里克的《鸽灾》（*The Plague of Doves*）中，通过对作品中印第安人的被诬陷与被杀害感受真实的痛苦、不公与同情，将对印第安人土地的占有与毁灭和鸽灾的生态灾难关联起来，在共情与同情的视域中看待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灾难表征。小说中写道：

“……以后你向别人提起我的死，要告诉他们我很勇敢。下面我要为自己唱一首死亡之歌。”……“老实跟你说吧，”过了一会儿卡斯伯特说，“没人教我唱过死亡之歌，他们觉得我不配。”“那就编一首，”阿西吉纳克说，“我帮你。”（厄德里克，2017：76）

穆夏姆告诉我捕猎水牛的老猎人看到地上满是水牛尸体时，他们心中有何感受。他们极度饥饿，看到白人的买卖方式披着脆弱的外壳，看到烧焦的小麦下的绿草，看到水牛如同虱子般，一群群地迁移，踏平蹄下的青草。（252）

穆夏姆看到过北达科他州的天上数不完的鸽子拍打着翅膀，天上一直传来低低的鸽鸣。他想，虽然鸽子的尸体像地毯似的覆盖在地上，可它们并没有真正死去，而是飞上天了。（263）

印第安人的失落与保留地生态环境的失落是具有强关联性的。鸽灾象征着道德的失落。道德的失落会导致对一切的残酷，生态和人文都走向一种灾难的景观。同时，随着生态的破坏与文化的失落，道德的境况会变得愈加不容乐观。在《鸽灾》中，厄德里克讲述了三位无辜的印第安人被残暴地绞杀，他们所遭遇的对待，就像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鸽子一样，被抢占了土地的资源、生存的资源。他们无力、悲伤，成片地死亡，就像铺满大地的鸽子的尸体。厄德里克温和而有力的叙述让我们感知到了平静背后深沉的痛苦和忧伤。当珍贵的土地逐渐被工厂占据，我们似乎听到了土地的哭声，那里包含着印第安人的鲜血与泪水。我们能够共情到土地与印第安人的呜咽，鸽子与大树的哭声。厄德里克通过呈现印第安人文化与生态的处境引出了环境正义的呼声。环境正义面对的是经济的不正义导致的生存的不公，获得少部分生存权益的群体却承受着更大范围的环境危机。从文学的场域当中阅读，我们发现，环境正义在深层意义上呈现出一种更大范围的灾难的黏合性、关联性与公共性。生态界是一种整体的空间，鸽灾不仅象征着印第安人土地与文化的失落，其更象征着一种人类整体的失落。厄德里克不仅表达出了对正义的呼吁，还有一种公共之爱的失落，对同情的摒弃带来的灾难。这样的叙述与写作给我们的批评启发是对公共性与同情性的呼吁与认同。从分裂与争夺的态势中撤退，走向公共的关怀、同情与博爱当中。

在对疏解矛盾的路径找寻中，厄德里克的作品《甜菜女王》（*The Beet Queen*）以女性之间相互的关爱、理解和对矛盾的化解指向了关怀伦理与良性生态的价值旨归。在《甜菜女王》当中，玛丽的处境是被挤压的生态、文化、性别的象征，通过她的坚韧、真实、勇敢，还有与斯塔、塞莱斯汀之间亲情与友情的情感关联与互相帮助，我们看到了最终那种爱意的和谐。作品表达了公共之爱所实现的生命的充盈、平衡与完整。《甜菜女王》通过讲述原住民的相互之爱对生活不公与残酷的化解，映射出对原住民生存地域失落与生态环境破坏的悲伤。同时，通过女性之间的团结、友爱表现她们对生活的信心，呈现出原住民意志的坚韧和对生命的捍卫。厄德里克通过叙述三

位女性之间的友爱与关怀，还有她们面对自然温和的态度，呈现了一种关爱的价值向度。

本来我担心玛丽会因为前一天斯塔的行为对她不满，说话刻薄。但她什么都没说，打扫干净面粉后，安心住了下来。（Erdrich, 1998: 275）

我经常离开蓝山，看看多特后再回来，但玛丽一直待在这儿，因为斯塔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中。（275）

我爱植物。很久以来，我一直以为植物死亡时没有痛苦。但有一次我跟玛丽探讨这个话题，她给我看了一份剪报，剪报上说植物被连根拔起时会进入休克状态，甚至会发出难以形容的声音，就像感受到了恐惧，一种只有在特殊乐器上才会出现的拉长的元音。不过我还是喜欢植物年复一年、生生不息的特质。我不喜欢剪下来的花，只喜欢长在地里的花，喜欢这些睡莲。（286）

保留地的路是砂砾铺成的，褐色的灰尘在车后漫天飞扬。一路上不见城镇的高楼，只看到某栋被废弃的矮屋，只有狗对它们不离不弃。（198）

在斯塔弥留之际，三位女性一起生活。玛丽与塞莱斯汀在斯塔最后的时光里对她进行了悉心的照料与呵护。她们之间的情感成为抗拒生存艰难的一种方式，她们用爱与关怀捍卫着原住民生命的珍贵和坚韧，对自然的爱与对和谐的追求呈现出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厄德里克用友情对苦难与贫瘠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也是用这种友爱、团结与包容对抗现实当中生存的艰难与生态的灾难，试图用爱来化解生存的困境，同时对造成土地消失与生态破坏的力量进行反讽与批判。厄德里克提供了一种爱的关联、交互和崇高的可能，提供了一种走向公共性的可能与方法。她指出了一种道德情感的进步，把情感和欲求引向某种理想的目标。努斯鲍姆意义上的公共情感正是基于女性的情感逻辑，女性的情感凸显的是一种相互性（reciprocity）。“既作为一种崇高情感的源泉也作为一种义务原则，更大的国家之爱和世界之爱可能以同样的力度加以培养。”（努斯鲍姆，2022: 104）在具有相互性的同情与爱的引导之下，我们将

逐渐有能力全面而明智地看到整体的福祉。泰戈尔的“人的盈余”(the surplus in man)的观念提供了一种想象和向美好理想迈进的勇气与可能。在艰难的处境当中,我们面对剥夺、失落和残酷,依然有力量和可能追求崇高的爱、宽容与悲壮。努斯鲍姆分析了泰戈尔的《人的宗教》,在其中支持这样的思想,我们需要一种自然的、欢快的、流动的生命感,在爱与快乐中完成漫长的生命历程。“这个社会必须在其核心处保有并不断获取某种新鲜的快乐和喜悦,它们是在世的且内在于自然和人的;从而宁愿选择爱和快乐,而不是那种物质攫取的死气沉沉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如此之多的成年人最终会过的;宁愿选择不断的质疑与探索,而不是任何给人慰藉的既定答案。”(努斯鲍姆,2022:132—133)在艰难的处境当中,依然葆有对生命的爱与激情,并且,以自然的包容性和多元性面对生命、敬畏生命、珍爱生命。

在《甜菜女王》中,厄德里克将植物的生命感、流动感,脆弱中内蕴的坚韧感与女性的情感连接起来。“睡莲”表达着一种“流动性”(Gibson&Gagliano,2017:125),其包蕴着女性的柔和、温暖与爱。在当代植物批评的语境中,植物并不只与女性的身体和情感连接,更是一种生命流动的形式,其对人类生命的关联性具有启发。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用“性态化”(sexuation)作为关键词发展了一种诗学,“性态化的过程发生在宇宙间包括植物在内的生命体之中”,植物的呼吸和生长有自身的节奏,不以人的意志改变。“植物自身的张弛、自然界中日夜交替和四季更迭都是性态化差异的表现。”植物以自身的方式进行着参与,“一朵花随着太阳和微风盛开,随黑夜的降临从大地汲取资源,花的绽放和闭合既是内在的、自身的进化,也是外在的、参与的过程”。这是花朵的生命形式,是花朵的性态化。伊利格瑞最终要给出的启示是:“通过植物”认识到一种性态化差异,培育一种不同生命体间的性态化体验,从而重新书写和释放被文化压抑的女性、自然和植物等诸多概念,最终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康毅,2021:129—132)对植物的性态认知关联到女性的情感过程之中,进而将这种关联性的情感扩展为公共情感与生命共情,经由情感的表达,达成对生命方式的理解,对生命意识的追求。

公共情感给环境批评研究带来的启示是,站在公共情感的视域中进行批评,对环境产生扩展性的同情与爱,从文本到场景实现生态保护的价值向度。当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比尊重更深刻的相互情感,更加类似于爱时,在相互性的交织中就会为某种幸福前景所震撼。自然的整体性与多元性让我们看到令人震撼的、异常美妙的、

难以言表的、真诚的生命的自由感。“一种内在自由的观念，一种恰恰在于不在乎等级制度的精神自由，这种自由既非试图避免被他人控制，也非试图控制他人。”（努斯鲍姆，2022：48）这种自由带领我们超越那种焦虑和始终不安的画面。这种以爱、理解、同情为代表的公共情感面对世界的态度和看法，将创造一种远离等级焦虑支配的生存空间。在公共情感流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感受、交互、认知、理解，最终爱与认同。在公共情感的视域下，一只脚在文本、另一只脚在大地上的环境批评会创造爱与正义并存的环境研究，在伦理向度的把控上客观而包容，在理性中不乏共情，让研究的方向走向公共、大地与真实。

#### 4 公共性与情感性作为环境批评研究视域的底层逻辑价值

公共情感直接关乎伦理问题，与环境伦理对生命共同体的关怀旨归互文，且感性与认知的公共情感有助于实现环境伦理的目标。公共情感的情感智性认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学中的诗性正义，再运用于环境批评中的实践认知理念，将环境批评的成果切实落在对大地的关怀中，形成实践、认知、再实践与再认知的良性循环，即文学能为伦理学提供启迪，同时伦理思想又能够指导文学的批评与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性与情感性的底层逻辑价值是其运用于环境批评中的基础。

##### 4.1 公共性作为公共理性与公共情感的通约性

阐释与公共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在知识论还是在价值论意义上，阐释都是人类精神存在的唯一形态，是人类精神生产的唯一方式（张江，2024：45）。阐释能够达成一种公共的信念，达成一种信念的真，对公共的信任与信奉，成为真的标准。阐释能够达成一种公共进步。关于阐释的过程，首先，由独立个体的经验而起，多元的个体经验形成了知识创造的机会。其次，在个体经验与群体经验的抵抗过程中，真理在时间的检验中达成。最后，阐释的公共进步的实现，由个体特殊的阐释在历史的检验中上升为一般，特殊性转化为普遍性，独立的阐释走向公共的阐释（45—48），最终形成一种思想通约（commensurability of ideas），即“不同思想的互通契约，是差异价值的缓冲机制和交流原则，也是文明通鉴借以走向人类普惠新文明的逻辑工具和必由路径”（刘洪一，2021：186）。在公共的场域中同中有异、异中有通、通中互

补，在交会融通中形成一种公共认同的观念。

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视域中，公共也意味着一种最大限度的公开性。“对我们来说，显现——不仅被他人，而且被我们自己看到和听到——构成着实在。与这种来自被看到和被听到的实在相比，即使亲密生活的最大力量——心灵的激情、精神的思想、感性的愉悦——造成的也是不确定的、阴影般的存在，除非它们被转化成一种适合于公共显现的形式，也就是去私人化（deprivatized）和去个人化（deindividualized）。”“他人的在场向我们保证了世界和我们自己的真实性，因为他们看见了我所见的、听见了我所听的。”（阿伦特，2017：32—33）阿伦特更强调在公共空间中被看见的个体的视角，“公共领域的实在性依赖于无数视角和方面的同时在场，其中，公共世界自行呈现，对此是无法用任何共同尺度或标尺预先设计的。……被他人看到或听到的意义来自这个事实：每个人都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和听的。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只有事物被许多人从不同角度观看而不改变它们的同一性，以至于聚集在它周围的人知道他们从纯粹的多样性中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世界的实在性才能真实可靠地出现”（38）。在公共空间中，对某一事物从不同角度进行讨论，表达个体的观点，形成一种良性的生态结构。中国文化当中的“语境”在多元的讨论与阐释中会形成一种观念，在独立阐释当中会形成一种阐释的“真”，在历史的检验当中，这种“真”影响着历史的走向，在历史的检验过程中形成一种历史性的真理。

上述我们看到了公共性本身所具有的扩展性、对话性和交互性。公共空间中观点的公开性与多元性塑造着理解的宽广性与公正性。阐释能够达成一种公共性，其所指向的不仅是公共理性，同时达成的还有公共情感。公共理性是阐释为公共的基本根据，是激发和推动阐释的积极动力，是约束和规范阐释的框架标准，是衡量阐释有效性的基本尺度。（张江，2022：4）努斯鲍姆在《爱的知识》中说明知识与理性不足以保证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只有渗透着情感的理性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同时，努斯鲍姆指出情感的不稳定需要理性原则的调整、检验与反思。（陈芬，2021：200）人类的想象与情感在建构理性的向度当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情感本身有认知性的向度，爱与正义有相互交叉的内容。理性与情感并非全然二元对立的存在。我们强调公共情感的培养，与中国文化语境当中的观念相通，即在多元的视角和表达的过程当中，最终会形成一种历史性的真理。面对环境危机在生态界的肆虐，我们在这一特定

的历史境况中需要形成一种扩展性同情的公共情感。在这种扩展性同情的认知与理解当中，情感的感知性与理性的判断性形成交叉的空间，对关怀性的环境伦理达成一种认同。

#### 4.2 公共情感作为环境批评研究视域的必要价值

公共情感作为一种规范伦理学的方法论启示，对环境批评的价值指向有深刻的指导意义。环境批评面向整个生态界的稳定和平衡，在文本批评的过程中有现实的价值向度。公共情感的介入是为了达成一种扩展性的同情，其情感的展开具备智性的特质。在公共情感的介入中，环境批评能够实现文本内部的意义阐发和文本外部的现实价值。

情感智性作为公共情感的核心特质，对我们的伦理选择具有指导意义，其贯穿着伦理选择的各个环节，包括展现伦理困惑、认清伦理处境，指导伦理选择过程并对选择进行反思。（陈芬，2021：198）公共情感并不是非理性的、混沌的、繁杂的，其具有意向性与认知功能。努斯鲍姆认为公共情感包含价值判断，是理性的一部分，“对情感的支持源自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学对人类本性中的感性冲动的支持，而随着现代认知心理学和心灵哲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情感与理性并非泾渭分明”（200）。努斯鲍姆以情感智性论加入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反省现代科学主义及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念的危机。尤其是当我们谈论生态危机背景之下的生存路径时，其本身与工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相关。为了突破绝对理性的桎梏，伦理选择有了情感维度才变得灵动，更符合人性，这样的伦理选择其实就是选择了爱，爱家人、爱朋友，并通过移情和同情爱远方的人（202）。爱的介入化解了绝对理性的冰冷，从而对环境灾难生成智性认知与生命共情。那么，当我们谈论环境批评的价值指向时，其能够介入我们对环境正义的关注与追寻当中，提供积极的指导意义。同时，情感的不稳定性需要理性原则的规约、检验和反思。所以，公共情感与公共理性在相互影响、相互交叉的视域中影响着环境批评的实践。

公共情感对环境批评内在价值的发掘意义。环境批评追求的内在价值是践行关怀理念与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文学与文化作品当中以阐释生命共同体作为核心价值诉求，同时，在观照生态界的整体性时，兼顾个体性、复杂性、多元性；在集体文化的记忆与个体体验的特殊性之间形成一种理解和认同。在跨越国家、民族、语言和文化

的脉络中寻求一种价值通约；在对公共性的尊重和理解中寻找和生成可能性的价值引力，在其中，观照种族的冲突、性别的差异、个体的多元，在生态的整体视野与公共的情感关怀中进行批评与建构。

环境批评也是一种叙事，其在特定的生命共同体伦理的引领之下进行一种价值通约与价值引力的表达、生成与建构。在尊重自然、理解自然、捍卫生命共同体的同时，注重内在的态度、体会和关怀。环境批评不仅是一种批评的实践行为，更是一种对现实生存的捍卫，其脚踏大地，与真正的实在密切相关。环境批评研究者“作为事件阐释者，必然会参与到事件之中进行选择，对于事件的植根性（embedment）和具身性（embodiment）恰恰是比较诗学的底色”（张进，2022：24），环境批评研究者处于事件当中建构着情感认知诗学。在进行文本批评与呼吁保护自然的同时，同样重要的是理解实践的必要性。保护生态界、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是其中一个层面的理解，其中，还有一层哲学、社会与共同体层面的公共性。个体行为方式传达着个体对世界的理解，我们要培养一种生命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具有共同体的意识。实现环境批评的内在价值需要塑造一种公共情感，其有助于公共事业的落成。

公共情感对实现环境批评内在价值的功用是：首先，作为环境批评的研究视域，启发研究者感受自然的遭际、种族的冲突、性别的矛盾，激发研究者的现实关怀。在分析文本当中的环境正义时，注重语境的体验性、情感性、公共性，将关爱伦理纳入环境正义的分析当中，促成环境批评内在价值的实现。其次，公共情感促成了读者对环境批评内在价值的接受。扩展性同情与爱经由环境批评的叙事影响到读者的理解与认同，进而影响到更多的公众，有利于生态保护事业的发展。最后，公共情感纳入环境批评的视域，突出了环境批评实践的伦理价值。

---

#### 参考文献

- [ 1 ] Callicott, J. Baird & Susan L. Flader. *The River of the Mother of God and Other Essays by Aldo Leopold* [ M ].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 [ 2 ] Erdrich, L. *The Beet Queen* [ M ].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 [ 3 ] Gibson, P. & M. Gagliano. *The Feminist Plant: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the Water Lily* [ J ]. *Ethics and the Environment*, 2017 ( 2 ): 125-147.
- [ 4 ] James, E. *The Storyworld Accord: Econarratology and Postcolonial Narratives* [ M ].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5.

- [ 5 ] von Mossner, Alexa Weik. From nostalgic longing to solastalgic distress: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love in the anthropocene [ C ] // Bladow, K. & J. Ladino ( eds. ). Affective Ecocriticism: Emotion, Embodiment, Environment [ M ].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8: 51-69.
- [ 6 ] 暗蓝. 当爱无法自足: 读玛莎·努斯鲍姆《爱的知识》[ J ]. 书城, 2024 ( 5 ): 123-127.
- [ 7 ] 陈芬. 努斯鲍姆论情感智性与伦理选择 [ J ].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1 ( 1 ): 198-210.
- [ 8 ] 范昀. 文学伦理的两张面孔: 玛莎·努斯鲍姆的文学观及其内在紧张 [ J ]. 文艺理论研究, 2022 ( 5 ): 69-81.
- [ 9 ] 方红. 化解生态伦理与环境正义冲突: 霍根《灵力》对环境伦理的想象 [ J ]. 当代外国文学, 2014 ( 4 ): 20-25.
- [ 10 ] 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 [ M ]. 王寅丽,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 [ 11 ] 霍尔姆斯·罗斯顿. 环境伦理学: 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 [ M ]. 杨通进,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 12 ] 康毅. 论伊利格瑞的女性主义植物诗学 [ J ]. 外国文学, 2021 ( 1 ): 126-135.
- [ 13 ] 刘洪一. 构建人类普惠新文明: 机理机制与逻辑工具 [ J ]. 中国比较文学, 2021 ( 2 ): 184-198.
- [ 14 ] 路易丝·厄德里克. 鸽灾 [ M ]. 张廷佺, 邹欢,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 [ 15 ] 玛莎·C. 努斯鲍姆. 政治情感: 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 [ M ]. 陈燕, 卢俊豪, 李晶,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 [ 16 ] 尚必武. 非人类叙事: 概念、类型与功能 [ J ]. 中国文学批评, 2021 ( 4 ): 121-131+158.
- [ 17 ] 杨乃乔. 比较文学概论 [ 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 18 ]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 [ M ].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 19 ] 张江. “公”“共”辨 [ J ]. 探索与争鸣, 2024 ( 3 ): 39-49+177.
- [ 20 ] 张江. 公共阐释论 [ J ]. 中国社会科学, 2022 ( 11 ): 4-26+204.
- [ 21 ] 张进. 事件阐释学与比较诗学的定位 [ J ]. 厦门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22 ( 6 ): 18-27.